新发现的黄宗羲两篇佚文及其价值

季学原

余姚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的龚烈沸同志在民国二十年编修的《余姚朱氏宗谱·家传》中，检得黄宗羲为朱舜水的族人朱尧淳、朱雅淳撰写的两篇传记，交由我们考覈，确认为黄宗羲的佚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现将点校稿抄录如次：

明庠生惩庵朱君传　　大房十六世讳尧淳

君讳尧淳，字四余，号惩庵，幼有至性，与兄弟就外傅，受夏楚必泣而请代，塾师为之矍然。稍长，从学于鲁庶常，语之以"良知"之旨，即能反己自证。母姜安人，病将革，君祈死神前，安人获愈。父官延平，君相助为理，以致清誉。已而父疽发于背，君复祈死（神），如母病时。同祖兄弟十三人，其有急难丧葬之事，君必尽其心力绸缪门户，咸当情文。讲科举之学于宗祠，摩荡鼓舞，絃诵灯火，不以兵戈而熄也。二十年场屋，陈腐宿说，披剥殆尽。君以为终非究竟，三复于象山、龙溪之集，纸弊墨渝，一日空庭溜决，身心静快，宿意顿融。嗟乎！若君者，岂复可以场屋之士目乎？其著《改过迁善箴》云："时时改过，过如拂尘，须慎之言动之前；念念迁善，善于捞月，当验之事为之后。"其所自得者如此。君虽不得行其志而行义，修内完外，彬彬乎一乡之和也，有吉人良士之实矣。年六十四卒。有子，能世其家。

征召史局黄宗羲撰

清诰授中宪大夫云南大理府知府湛侯朱公传　　大房十六世讳雅淳

公讳雅淳，字湛侯，以壬午举人授南康府推官，迁惠州府同知，升云南大理府知府。其在任南康，用心平恕，平反数大狱，皆人所不敢者。每季官集公所，抚军张公兆麟必指公谕众曰："爰书若南康，所谓文无害也。"因位公于诸府之上，以励各官。南康故有白鹿书院，明季来规制久废，公首修复之，捐俸以膳学者，弦歌之声顿起。在惠州署，河平县大盗蓝青率众薄城，既知为朱海防，不敢犯而退，受抚者数千人。于大理府，则减盐额，蠲渔课。郡胥收粮，其斗斛羡余较诸郡尤甚。公初至，胥吏案例以进，公不知也。既而知之，悉为除去，解户欢悦。讫公去任，其署中食米，犹初至之羡余也。将去大理，袱被而外，止屏石一片，又以无力扛运弃之。古之廉石在家，公之廉石在官，事异而风同矣。公族有家于永昌者，至则建祠，睦族有子为旗丁所掠去，公捐百金以赎之。当越中扰攘时，浙西避地者多依于公，若朱一是、屠爌、谭贞良、汤来贺等，仓惶渡海，公一一衣食之。姚邑距钱塘三百里，江上炮声轰然，如在左右，人民无日不震惊，独公家置酒高会，依公者皆忘为乱离也。故海内谈气谊者，无不屈指于公云。

征召史局黄宗羲撰

这两篇佚文，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

一、为考辨黄宗羲晚年思想提供了新的史料。

黄宗羲晚年的反清思想是否有所淡化、混乱，甚至产生根本性逆转，一直是学术界分歧颇大、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两篇佚文至少从两个方面提供了新资料：（1）文末之题署“征召史局黄宗羲撰”；（2）传文中不但不讳言朱雅淳接受清廷诰授，而且热忱赞扬其政绩；同时，对其抗清义举亦予表彰。

在这两篇佚文末，没有如通常那样署以姓名、字、号，而在姓名前冠以“征召史局”。这在黄宗羲的题署中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瞩目。旧时，文人称曾受朝廷征聘而不接受官职者为“征士”、“征君”。如在日本水户的朱舜水的墓碑上，镌刻的便是“明征君子朱子墓”。黄宗羲此署，显然表明他是接受康熙帝之征聘而出仕国史馆的。这在黄宗羲的思想历程中，是一件十分值得考究的大事。

康熙时再次开史馆纂修《明史》之初，康熙帝曾几次以礼征聘黄宗羲进京修史，黄宗羲均托辞拒绝，康熙帝亦未予勉强，而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命地方官尽抄黄宗羲有关著述移送史馆，后来《明史》总裁又曾将部分史稿送请黄宗羲“去冗正谬”。研究者一般均认为，黄宗羲的反清思想直到这时依然很强烈。实际上，黄宗羲的民族主义思想较之清初已有很大变化，他已不再称清朝统治者为“夷狄”、“伪朝”“虏酋”，径呼为“清”，至康熙二十五年他在给内阁学士徐乾学的信中已称康熙帝为“圣主”，“风仁笃烈”。对于康熙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尤其是对他这样的学者所采取的明智、宽松的政策，他并不是视而不见、固执成见的，他亦采取了一些灵活通达的态度，清初确立的“毋仕异代”的原则，实际上逐渐为“可仕新朝”所取代：他的学生陈介眉、郑禹梅、仇沧柱等都先后通过科试做了清廷的官；他自己虽未应聘入史馆，却让他的学生万斯同、万贞一和儿子百家代他进了史馆，万斯同是不领俸不受衔的，是“布衣”，但万贞一和黄百家却是既领俸又受衔的；对《明史》总裁的请教，他是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的，不但认真审阅、补充、修改了史稿，而且附书详述了自己的见解（参见拙著《黄宗羲诗文选》302页《答万贞一论明史志书》）。这一切都发生在康熙十几年。而“征召史局”之题署就出现在这之后不久（具体时间尚难考定）。这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考察，他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均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他既坚持反对清朝统治者入关时的残酷的民族征服政策，又实事求是地审视了康熙帝统一全国之后所采取的一些新政策，不断相应地调正自己对这个“新朝”的态度。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时，他是高度概括的，反对的是一切君主；但在对待某个君主功过是非时，他又是具体分析的（虽然在个别地方有所偏颇）。这表明他已具有一定的唯物史观。

总之，黄宗羲的这一变化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误谬。

在古代，“征召”亦称“征聘”，是指朝廷以礼召聘有学行的人出任官职。黄宗羲在作此题署时，看来是经过斟酌的，他是以有学行的人物自许的，他应聘是为了修明史，而不是向清廷屈膝求官、取宠、乞俸，所以在“征召”后面又缀以“史局”，用心不可谓不苦！

这一切，和他对朱雅淳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一方面对朱雅淳接受清廷诰授并作出显著政绩进行表彰，同时又对朱雅淳于明末清初时的抗清义举进行表彰。二者不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

二、为考索黄宗羲与朱舜水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

黄宗羲和朱舜水都是明清之际两位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巨人、思想家。但是，这两个杰出

人物的关系，却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他们同是余姚城郊人，又生活于同一时代（朱舜水生于1600年，比黄宗羲大十岁），并且都曾是抗清的民族志士，都曾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等方面作出过杰出贡献。但是，他们却从无交往，彼此在著述中亦从未道及。对这一罕见的文化现象，国内外学者都曾有所触及，如民国初年汤寿潜的《舜水遗书》序，许啸天的《朱舜水集》序（1926年版），梁启超的《近三百年学术史》，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黄宗羲和朱舜水》，安积觉的《舜水先生行实》等，但都因缺乏确凿的史料作论据而未能解开此谜。

八十年代，黄宗羲研究有新的开拓，朱黄之谜的研析也进入了新阶段。首先是白砥民在宁波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以《黄宗羲和朱舜水》为题，较为系统地对朱黄关系进行了考辩，认定朱黄二人不但从无接触、交往，而且“始终未见相互道及”，并认为：“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上的分歧”。继而，钱明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以《黄梨洲朱舜水关系辨——兼与白砥民先生商榷》为题，从五个方面作了论证，结论与白文完全相反：“梨洲与舜水早年曾是朋友”，三十年后以《两异人传》一文为朱舜水立传。钱明认为“梨洲《两异人传》所记诸士奇必为朱舜水无疑”。一九八九年宁波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第四期又发表了张如安的《异人诸士奇探究》，从里闬、行年、姓氏、字号、家族、身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结论是：黄宗羲《两异人传》中的诸士奇与朱舜水绝不是一个人，而是毫不相关的两个人。这样，钱文的关键论据便不能成立了。于是朱黄之迷也就依然是个谜了。

黄宗羲的这两篇佚文和录存这两篇佚文的余姚朱氏二宗谱，对揭开朱黄之谜，至少提供了以下三方面颇具价值的线索：

（一）检录存这两篇佚文的《同治余姚朱氏谱》（清同治十二年修纂）与民国二十年修纂的《余姚朱氏宗谱》：朱舜水与朱尧淳、朱雅淳同为余姚一本堂朱氏后裔。一本堂朱氏始祖朱正秦有三子，长子世居余姚城南冠佩村，次子、季子迁居余姚城北郭龙泉山下。次子端二传至第六世又有三子，朱舜水是其三房的后裔，朱尧淳、朱雅淳是其大房的后裔，仍居于龙泉山下，和黄宗羲的故里只相距几公里。朱舜水是一本堂的十四世孙，朱尧淳、朱雅淳是一本堂的十六世孙，他们辈份不同，但年龄却相差无几：朱尧淳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卒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朱雅淳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他们基本上生活于同一时期，是同乡同龄人。从朱舜水的《与男大成书》《与诸孙男书》《与源光国（即德川光国）书》（均见马浮编《舜水遗书》）等史料中可知：朱舜水的子孙均生活于余姚龙泉山下。再将朱舜水的嫡孙朱兰、朱元树先后主编的朱氏宗谱时，均收录了黄宗羲的热忱表彰朱尧淳兄弟的传文事实，与上述情况综合起来看，至少有两点是颇清楚的：朱舜水及其后裔与大房朱尧淳兄弟之间，是睦族，关系并不疏远。而作为同乡同龄人，黄宗羲如此热忱地写下了赞扬朱尧淳、朱雅淳兄弟德行、政绩的传文，从中自然可以窥见朱黄基本关系之一二。

（二）朱舜水幼年即随其父朱正离开余姚，寄籍于父亲的任所松江。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朱正逝世，朱舜水随长兄朱启明继续留居松江。据朱舜水说：他与兄长同胞情笃，“步寸不离”（见《舜水遗书·与男大成书》）。朱舜水的举业也是在松江完成的。直至清顺治二年（1645）朱舜水因受到南明小朝廷的威胁才离开松江。由此推算，朱舜水寄居松江长达三十七八年之久，其间，迄今无回余姚之可靠记载（梁启超在《朱舜水年谱》中称朱舜

水曾同余姚四明山，但并无确凿史料可据）。离开松江后，朱舜水即辗转于舟山、安南、日本之间，先后七次东渡日本后，于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在日本定居，被水户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国师"，直至逝世。今存朱舜水之著作，几乎均撰于日本，其文集最初也是由日本学者辑编刊行的，一直到同治十一年（1885）才由其去日本的裔孙朱憬然带回国内（见《余姚朱氏谱》所附朱元树文与世系图朱正函条下注）。综上所述，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去日本之后，朱舜水和黄宗羲始终分隔迢远，加上国事纷扰，他们之间是没有交往机会的，彼此是无从相互了解的，因之，便无法相互评说。这原是极常见的事。

（三）辑录黄氏二文于朱氏宗谱的朱兰，是清道光九年进士，历任编修、湖北学政、朝考阅卷大臣等职；朱元树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进士，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编修、实录馆协修等职，二人都是有较高文化修养、史学修养的人物，他们将黄氏二文收入宗谱，应该是审慎的，表明他们对黄宗羲是很敬重的。而从民国《朱氏宗谱》卷首朱舜水肖象旁附载的朱元树的短文中，又可显然看出朱元树对朱舜水是十分崇敬的：他留学日本后，曾两度设法进入"非士人不得入"的水户侯源氏墓庄，拜谒了其间的朱舜水墓，又排除尼阻，得以瞻仰朱舜水生前雕像，并摄影以归，使朱舜水之遗像始得在国内流传。短文的字里行间，充满敬意。上述两方面情况表明：作为朱舜水的嫡孙，朱兰、朱元树对朱舜水和黄宗羲都是很敬重的，从中自然可以窥见朱、黄关系之一二。

上述线索，可以启发，引导我们继续多方求索朱、黄有关史料，以便早日解释朱黄之谜。

（上接第128页）

；2

再论纳兰成德奉使西域　马乃骝　传统文化 1991：2

香妃画像考　于善浦　紫禁城　1991：6（总67）

鸦片战争前夕的地主阶级改革家陶澍　王炳护　广东民族学院学报　1991：1

钱钟书与清学　胡河清　晋阳学刊　1991：2

章学诚别议　周积明　史志文萃　1991：6

杰出的东北史地学者曹廷杰　范秀传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1：2

萧一山和他的清史研究——纪念他逝世十周年　戎笙　清史论丛　第八辑　1991：6

清代吉林地方将军富俊　范厚　北方民族 1991：1

无闻　吴玉清